

# 日本民主党对外战略方向评析

杨伯江

[内容提要]日本民主党对外战略在经过三届内阁的摸索后最终明确了方向。新战略不仅体现了民主党主流派的意志,也表现出对自民党政策的高度继承性,说明日本朝野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已经形成共识。从内容看,新战略以获取政治安全利益、分享经济红利为主题,实施多元化布局,并以中美日三边对话为核心机制。新战略以一系列长波因素为基础,因而具有持续性、总体稳定性,方向不会逆转。美国因素将持续发挥推动作用,日本政局、财政状况可能影响到战略展开的节奏与力度,对华负面心理若遇偶发因素刺激或将导致脉冲式政策反弹。

[关键词]日本 民主党政府 对外战略 日美同盟 对华关系

[作者简介]杨伯江,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大国关系、周边安全、日本问题。

2011年“3·11”灾害事件以来,日本并没有“内向化”,相反在外交安全上表现得十分抢眼。日本民主党在经过三届内阁的摸索与试行之后,终于确定了对外战略的方向。野田内阁的对外动作尤其体现了现政权或民主党主流派的主张,而且显露出对自民党政策的高度继承性,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日本朝野的统一意志。抛开权力斗争等国内政治层面,仅从对外形势认知、政策观念与思路看,日本政界实际上已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共识。由此说来,民主党对外战略具有持续性、总体稳定性,各种决定性变量的互动会不时影响其对外战略实施的节奏,但不会导致其方向的逆转。

—

日本民主党“回归自民党”从菅内阁开始,到野田内阁更进一步。这种回归涉及诸多方面,包括在国内政治手法上,执政党和内阁人事安排搞派系平衡,决策借重外务、财务省厅官僚等等,无处不“去鸠山化”。外交、安全是野田内阁最活跃、政绩最突出的领域,但其布局、思路乃至政策策略都可窥见民主党对两年多执政的反思与总结,可窥见民主党对自民党路线的悄然承袭以及根据形势需要和民主党

自身特点所做的调整,是日本朝野主流派共识的集中体现。民主党野田内阁的对外战略方向从中可见一斑。

其一,战略主体性日益增强。日本对外战略在冷战后经历了短暂的“战略漂流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逐步明确方向,但反复受到国内政治变局的影响。尽管“失去”了20年,日本仍在坚持政治大国化目标,故而不断增加“在国际社会发挥合宜的作用”以求趋近目标。从自民党到民主党,历届内阁在对外战略方向上看似摇摆不定,但本质上只是实现目标的路径偏好有所不同——借重美国多一些或者借重亚洲多一些。日本要真正“独立”,首当其冲的牵制力量是美国,但现阶段日本无力向美国“叫板”,中国崛起更使日本无意这样做。于是,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发展,成为当下日本的基本思路之一。亚洲的快速发展又促成了日本的第二条思路,即最大限度地借助邻国因素带动本国经济增长。

日本具有独特的战略文化,有追随强者的传统,但并不缺乏追求政治战略独立的冲动,否则就无法解释2009年鸠山为何能够依靠标榜与美国“对等”而赢得选举。现阶段日本缺乏的是实现目标的禀赋

与资源。实际上,从自民党的桥本内阁、小泉内阁到民主党的野田内阁,日本外交安全政策在从战略制订到政策设计的诸方面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一切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桥本一面携手克林顿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推动同盟“再定义”,一面考虑抛售美国国债,维护日本经济利益。小泉以派兵伊拉克换取美国容忍日本干预汇市、压低日元,以改善经济恢复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多项“有事法制”,为日本发挥政治安全作用铺路。同样,野田为修复日美同盟不遗余力,但在进口伊朗石油等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却不肯对美让步。而且,与自民党相比,在对待“日美同盟”与“日本战略”的关系上,具体如在“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战略”还是“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之类重大问题上,民主党给出的答案更为简单明了——日本利益是核心,日美同盟是维护利益、追求目标的阶段性工具。

其二,外交战略具有进取性的外向型特点。在世界几大战略力量板块之间,无论从“新、旧”对比还是从“东、西”对比看,过去20年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对新兴国家、非西方国家的优势都有明显削弱,但日本是唯一例外。日本经济总量与新兴国家、亚洲邻国之比下降得甚至比美国还快。鉴于经济要素在日本的国力结构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经济衰退及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使日本对外越来越难以保持过去的从容,其对外政策因此更具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色彩,对外行动更显急促甚至焦躁。实际上,从自民党政权后期开始,日本就一直为如何不输掉“全球大竞争”而苦思苦斗。

与自民党相比,民主党在国内政治问题上更具自由主义倾向。它作为新兴政党与战前政治没有太多瓜葛,在侵略战争历史问题上态度开明,对皇室一族也不像自民党那般过于恭敬。2005年野田曾提出“甲级战犯非战犯”论,但此举更多反映的是朝野斗争的国内政治背景。同时,民主党更重视对外关系中的现实利益,在外交、安全上更强调战略性、进取性。鸠山内阁重点借助“拼外交”弥补经济失速造成的国力下滑。如须川清司所述,“外交拙劣是导致日本近年来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关键因素,强化

自主思考、奉行‘智慧外交’是未来日本的出路所在”。中国赶超日本已近在眼前,“日本经济上的沉沦或许在所难免,但国家的没落并非不可避免,关键是能否有效地推进战略性外交”。<sup>①</sup>之后的菅内阁把重点置于“拼安保”,野田内阁则是同步推进“战略性外交”和“进取型安保”。

其三,外交、安全政策更重谋略和布局。从安倍2007年在印度提出“民主大亚洲论”开始,后小泉时代几乎每届内阁都有自己的“外交关键词”,如福田的“共鸣外交”、麻生的“自由与繁荣之弧”、鸠山的“东亚共同体”,等等,只不过都是昙花一现。相比之下,野田内阁的对外政策平实而“手辣”。2010年7月希拉里表态介入南海争端,日本主流媒体捕捉到了这一动向,深陷参议院选举、党内选举的菅内阁却未能作出反应。<sup>②</sup>野田内阁则完全不同,它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洲,稳住外交、安全政策“基轴”,其措施之一是恢复2014年解决普天间基地问题的谈判目标,之二是表态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TPP事关亚太未来战略格局,日本之所以参加谈判,首先算的不是经济账而是修复日美互信的政治账<sup>③</sup>,其次是多边战略考量。TPP最终可能搞不成,日本了解批准此类合作协定的权限不在白宫而在美国国会;日本最终也许不会加入TPP<sup>④</sup>,但宣布加入谈判却可以增加日本战略选项、扩大回旋余地,而且极可能借此推动中日韩实现“高层次合作”。

日本外交常为在美国与亚洲之间找平衡而纠结,但野田内阁通过按领域、范围推进相互交叉、相辅相成的多元布局,成功跨过了这一层面。它将中国与“中国之外的亚洲”区隔开来,同步强化对美安全合作、对华经济纽带与对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不仅避开了上述难题,而且增加了对美、对华关

① 须川清司「外交力を鍛える」,日本講談社出版,2008年9月。

② 「南シナ海 中国進出の抑止は国際連携で」、読売社説、2010年8月18日。

③ 日本野村证券首席研究员川崎研一测算,建立中日韩FTA能对日本实质GDP增长率产生0.74%的拉升效果,高于日本加入TPP将带来的0.54%的提升比率。

④ 日本专家测算,实施零关税将给日本带来8.24亿美元的贸易红利,但日本粮食自给率将从目前的40%降低到约14%。

系的筹码。在周边,日本与韩国的安全合作悄然深化,开始商签《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及《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日本与东南亚关系明显升温,包括与缅甸商签投资保护协定。尤其是“通过加强与越南、菲律宾的战略伙伴关系,日本在东盟获取了更大的战略纵深。这不仅能为日本提供在东南亚地区安全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机会,而且能让地区内国家产生某种抵抗中国的自信”。<sup>①</sup>

野田内阁对外政策显露出对大国多边博弈的强烈意识,基本思路是安全上加强与传统大国合作,经济上加强与新兴大国合作,但对印度的政策是唯一例外。日印合作事关日本大国多边博弈,又是其地缘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印度由此成为日本加强安全及经济合作的双料政策标的。借助与印度合作应对中国“海洋活动”、确保海上航道安全,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与印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之争告一段落后的一项重要调整。2000年森喜朗访印,称日印是“天然盟友”,“只要看看地图就能明白——印度处在中国的后庭”。2007年安倍访印,提出“民主大亚洲论”。2008年两国就在安全领域建立全面合作机制达成协议。2011年12月野田访印,双方发表加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同意扩大海上安全合作;2012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将与印度海军举行首次联合军演。下一步,预计印度将成为日本主要武器出口市场之一。

## 二

获取政治安全利益与分享经济红利是日本对外战略的两大主题,美国、中国是日本的主要合作对象。在多元化战略布局中,日本将中美日三边对话作为核心机制,以借此实现经济利益与政治安全利益的对接。

首先,安全战略两线并进。日本先驱新党党魁武村正义1994年曾出版《小而闪光的日本》(「小さくともキラリト光る日本」)一书,与小泽一郎此前一年提出的“正常国家论”针锋相对,主张日本做军事小国,同时注重解决环境问题与保护社会弱者。此后日本一直在变小。从自然禀赋、战略文化、人口结构等基本要件看,日本体量缩水实属回归历史常

态,但关键是它选择在哪方面“闪光”。这是区别日本政坛传统保守派与“战略保守派”的一道分水岭。民主党安全政策的变化与它内部权力转移相同步,“进取型安保政策”主要体现了少壮派“安保团队”的意志,而他们对“闪光点”的选择与传统保守派大异其趣。

调整后的民主党对外战略在政策手段上更为多样化,军事要素在其中占比明显增加。2010年底菅内阁修订防卫计划大纲,从战略思想到军事部署都有重大调整,但“3·11”复合型灾难打断了落实新大纲的进程。受社保费用与偿债开支的挤压,2003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小幅下降,财政压力极大,“3·11”后雪上加霜,这反而刺激了“安保团队”加紧放宽“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2011年底野田内阁最终决定大幅放宽该项禁令,参与武器研发和生产的国际合作。日本武器出口从“原则上禁止”变为“原则上不禁止”,既是参与世界军火市场、缓解预算压力、扶助军工产业、提升装备水平的现实利益,更标志着日本决意进一步解除战后“自我强加的约束”,拉动“进取型安全政策”继续上行。

在日本新安全战略中,加强自主防卫力量、推进日美军事一体化及构筑地区“民主安全网”是三大支柱。其中,一属“隐性主线”,二属“显性主线”,最新动向是野田内阁决定采购美国F-35作为航空自卫队新一代主力战机。日本虽然未获得原本属意的F-22,但F-35采购项目足令它收益颇丰:美国承诺F-35可向日本展示有关机身隐形等机密情报,部分零部件的生产及组装也将在日本进行;F-35属美澳等9国联合研制,日本通过此次采购将首次加入航空军工技术的多国合作开发;F-35也是美国主力战机之一,日本装备F-35有利于日美空军作战系统兼容。在第三个支柱——构筑地区“民主安全网”方面,日本把韩国、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列为重点合作对象。2011年9月日菲签署联合声明,日方承诺通过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帮助菲加强海岸警备队装备。这标志着原本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开发的ODA政策开始变异,日本影响地区形势的

<sup>①</sup> Joshy M. Paul, “Asian powers scrambling for regional space”, *The Japan Times*, October 24, 2011.

政策手段也不再限于经济外交。

其次,重点与中国合作、分享经济红利。日本因地缘及政治因素而在安全上具有特殊脆弱性,日美同盟对它事关生死。同样,海外经济利益决定着日本的兴衰。两者都重要,但兼顾不容易。冷战后,资本、市场要素对国际关系影响的上升,以及日美同盟的结构性变化,对日本对外战略构成挑战。冷战时期,日美互为太平洋彼岸最重要的安全盟友与经济伙伴,两种身份高度融合,但冷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日美之间不再相互兼有这两种身份。为此,日本不得不将安全与经济分开考虑,对外战略的两面性由此增强,在对华政策中的表现尤为典型。

小泉任内,中日关系政治上僵持,但贸易、投资合作却迅猛发展。小泉主张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不是威胁、是机遇。这得到安倍等右倾保守政治家的普遍赞同。在此之前,在中国“入世”问题上,由于利益诉求不同,日本已开始采取有别于欧美的对华政策。时隔10年,野田更进一步,主张“中国的发展”“对日本和世界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这一变化,反映了日本日渐明朗的形势认知与强烈的政治意愿——通过不断深化日中合作确保国内繁荣。正如大前研一所说,“以中国为主顾”是21世纪日本的出路所在。购买中国国债,是野田内阁为此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步骤。100亿美元的分批认购量在日本巨额外汇储备中所占甚微,但涵义颇深,它主要还不是出于贸易避险等短期利益需要,而是反映了日本对美元长期走势、人民币国际地位以及日中经济合作的战略预期。

日本对外战略的两面性源自其内在矛盾性。这在对华关系上表现为,经济利益的牵绊会对其安全政策产生明显的限制作用。日本对华安全关注目前已达到战后历史高点,防卫计划大纲、年度防卫白皮书等官方文件及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东亚战略概览》、2011年4月首发的《中国安全战略》,无不连篇罗列中国的“海洋行动”及“军事不透明”,但表述均止于称之为“地区安全的忧虑事项”。2011年,日本研究界提出要在冲绳宫古海峡一带对中国采用“非对称战法”,以“区域性拒止”阻止中国突破第一岛链。<sup>①</sup>“非对称战法”的提出,说明日本面临防卫预

算的压力,也尚未下定决心与中国展开全面对抗。

其三,多元布局以中美日三角为核心。在日本新的对外战略中,“国家利益”突出,政策手段丰富,布局趋向多元。日美同盟的定位呈现“相对化”趋势,仍处首位但已非唯一。因为随着中国崛起及中美合作的发展,“日美同盟的有效性、可靠性在下降,日本外交需要进行多元战略选择,紧扣国家利益,发挥自身优势”。<sup>②</sup>同时,中国因素占比上升,日美、日中、中美三对双边关系互动活跃,中美日三角占据日本多元布局的核心,直接影响其他环节,决定战略整体的成败。

日本渴望形成相对稳定的中美日三边对话机制,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日本过去20年一直对三国对话满怀期待,野田内阁也多次发出类似呼吁。其潜台词之一是通过三边机制实现经济与安全利益对接,缓解对外战略的内在矛盾。之二是借助美国因素规范中国发展方向。从小泉到野田的“中国机遇论”反映了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有乐见“中国的发展”、希望与中国长期稳定合作的一面。随着日本老龄少子化的加剧以及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内需的扩大,日本对华经济依赖日渐明显。2011年9月日本与台湾签署投资协定,本质上也是要借道海峡、取利于大陆。但日本在安全上对中国不放心,需要仰仗美国的“共同塑造”。之三是借助中美自抬身价,增强在国际上、地区中的话语权。日本属世界战略力量板块之间的边际国家,盛时可以充作“连接亚洲与世界的桥梁”,式微时则会跌入太平洋两岸间的“战略洼地”。经济长期低迷加上自民党政权后期地区外交的失败,使日本对朝核等地区安全问题难以实质性介入,地缘政治地位下滑。野田内阁多次提出与中美共同讨论亚太秩序问题以促进地区安全,用意十分明了。

### 三

日本对外战略以一系列长波因素为基础,方向

<sup>①</sup> Robert C. O'Brien, "China's Two-Pronged Maritime Rise", <http://the-diplomat.com/2011/07/24/china%E2%80%99s-two-pronged-maritime-rise/>. (上网时间:2012年2月6日)

<sup>②</sup> 須川清司「外交力を鍛える」,日本講談社出版,2008年9月。

既定就不会逆转。在外部影响因素中,美国战略将继续发挥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国内影响因素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政局及财政状况可能影响战略展开的节奏,另一方面对华负面心理则暗藏政策亢进的危险。

一是美国因素将推动日本持续“进取”。从冷战之初调整亚洲战略、对日政策变削弱日本转化为扶植日本开始,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直对日本恢复、强化军力及扮演政治安全角色起着推动作用。1953年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日,公然质疑几年前麦克阿瑟为日本“钦定”的和平宪法,称“放弃战争的宪法是错误的”。1969年尼克松发表关岛讲话,宣布实行战略收缩,要求“亚洲盟友自己承担起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的责任”,引发日本防卫政策一波躁动,日第一份防卫白皮书、防卫计划大纲相继出台。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经贸领域对日打压,同时要求日本停止“蹭车”,承担起更多的国际政治安全责任。

出于平衡中国影响力的需要,当前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看到日本“更强有力”。奥巴马上台后用了一年时间重新认识日本的价值,而新的价值发现是与在汇率、气候等全球性问题及朝核等地区安全问题上对中国“失望”相同步的。<sup>①</sup>2010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突出强调美日等“紧密同盟关系”的重要性。9月钓鱼岛水域非法抓扣事件后,希拉里、奥巴马、国防部长盖茨分头对日方表态: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美国对其负有防卫义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访日时表示“对美国来说,如果没有与日本强有力的关系,无论是在外交上、政治上还是在战略上,都将无法在亚洲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而背景是“奥巴马政府在考虑对美国的全球态势进行重大的再平衡,日本对这种再平衡的实现不可或缺”。<sup>②</sup>

美国宣布战略重点东移、军事重返亚洲,并削减年度防务预算;宣布其地区军事部署与在日普天间基地问题脱钩,将驻冲绳8000名海军陆战队部分回撤关岛,部分轮防澳大利亚、菲律宾与夏威夷。这些都将是刺激日本下一步采取更具进取性的安全政策,如填补美军后撤留下的“防卫真空”、对东海海域给

予更多的政治和军事投入,等等。实际上,早在防卫计划大纲修订过程中,2009年、2010年分别效力于自民党、民主党政权的两个首相咨询班子(“愚谈会”)即提出了相互一致的政策建议:在日本与其他国家存在争议的岛屿及周边水域,美国越来越不能提供有效的威慑,日本需要在这些区域强化自主防卫能力。<sup>③</sup>

二是日本政局及财政状况“不给力”。2009年民主党上台,日本特色的两党制框架确立,但基于宪政与国情的特殊性,包括议会内阁制下的高频率选举及参议院的独特作用,日本政局仍难以就此稳定。1994众议院选制改革以来日本共进行了6次参议院选举,但仅有1次是执政党或执政联盟获胜。靠众议院选举上台的执政党在随后的参议院选举中落败,形成“扭曲国会”,几乎成为日本政治的一条铁律,参议院对众议院多数党即执政党的牵制作用大幅上升。这实际反映了选民对执政党政绩的不满及对“一党独大”格局的排斥。参议院对峙内阁、众议院的格局今后将长期存在。而且,执政党为了本党能长期执政,倾向以改选党首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接,但后续内阁未经众议院大选、未经民意检验而上台,其合法性、权威性往往备受质疑,作为弱势政权的施政因而颇为乏力。

同样,财政窘迫也是可能导致日本对外战略展开迟滞、展开力度受限的重要因素。以日本官方刚刚发表的2012财年预算草案为例,日本财政总收入的49%要靠发行新债获得,比例之高史无前例。据财务省数据,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到2012财年年末即2013年3月31日预计将达到937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占GDP之比将达到195%,超过意大利和美国,在传统发达国家中高居首位。野田内阁试图借提高消费税解决财政危机,但这势必加重选民负担进而抬高政治风险系数。政

(转第47页)

<sup>①</sup> Peter Ennis, “Why Japan Still Matters”, *Brookings Northeast Asia Commentary*, Number 49, May 16, 2011.

<sup>②</sup> Peter Ennis, “Why Japan Still Matters”, *Brookings Northeast Asia Commentary*, Number 49, May 16, 2011.

<sup>③</sup> David Fouse, “Japan Unlikely to Redirect Defense Policy”, *PacNet*, Number 26, Pacific Forum CSIS, May 5, 2011.

单纯是某些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双边事务,合作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受援国的意愿。中国和西方都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即由于西方国家在殖民时代的种种“罪行”和援助时代的种种“失误”,非洲国家对于西方的“积怨”颇深。这与中非之间几十年来形成的兄弟般的友谊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换言之,西方数万亿美元的援助并没有在非洲赢得人心。

通过同一些非洲官员的交流,笔者发现,非洲方面对于西方提出的与中国进行多边或三边援助合作的想法不以为然,他们力图摆脱西方的援助模式并和中国开展有效合作。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可能置非洲国家的意愿于不顾而与西方一起展开对非援助合作,否则,中国在非洲的形象也会大打折扣。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可能取决于西方对其殖民史和发展援助史进行整体反思,认真对待非洲的批评。当然,中国的援助理念、援助模式至少为西方提供了一

面进行反思的镜子。

再次,鉴于中国、西方、非洲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未来有可能的合作只能从一些具体援助项目入手,而发展政策也必须落到实处。从 2011 年爆发的东非大饥荒来看,非洲摆脱贫困、谋求发展的第一步还是要实现农业发展,其实西方和中国的发展经验也是如此。只有当农业开始盈余时,工业和其他部门的现代化才可以起步。农业问题以及类似的基础建设、医疗、能源环保等领域不牵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人类生存必须解决的经济问题,争议性不大,因此可以作为各方合作的起点。

总之,无论是西方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或是中国面对西方在对外援助领域寻求合作的诉求,还是非洲国家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也许大家都是“老同志遇到了新问题”。鉴此,各方加强交流、积极对话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责任编辑:黄丽梅)

(接第 40 页)局不稳与财政拮据问题不足以改变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方向,但可能在速度和力度两方面构成牵制,使其对外战略行动的步伐放缓、力度减弱。<sup>①</sup>

三是对华负面心理可能引发脉冲式政策反弹。中国因素对日本内政外交的影响正在空前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安全战略的走向。在中华文明主导的东亚国际关系史上,日本曾长期特立独行,对日中关系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抵制并最终挑战“华夷秩序”。现实中,日本在近代以来一直自诩为“亚洲优等生”,但在经济上对华深度依赖,因此对中国发展的心态颇为复杂。《读卖新闻》2011 年 12 月 18 日报道,根据该报与美国盖洛普联合民调,日本受访者中 67% 认为在经济领域中国会“越来越重要”;68% 认为今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会进一步增强;80% 认为中国对日本构成军事威胁;85% 表示“不信任中国”。仅从这一角度看,中日关系脆弱的一面短期内也很难改变。

在上述政治生态环境及社会心理背景下,日本国内转型的内在压力、朝野权力斗争,都可能由于偶发事件等的刺激转化为对外冲力,导致外交安全政

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瞬间虚火上升,态度亢进。日本在野党为困扰执政党、显示自身存在,往往拿中国问题说事儿,而执政党为取悦于选民、维护政权也必须同调回应,结果是朝野围绕对华关系展开“示强比赛”。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一些政治家在下野后对华态度倒退,并非右倾保守派的自民党党首谷垣禎一率领本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要求内阁将钓鱼岛收归国有并“考虑常驻自卫队”,倒逼民主党在该问题上对华强硬。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对此必须予以重视和关注。○

(责任编辑:黄昭宇)

<sup>①</sup> David Fouse, “Japan Unlikely to Redirect Defense Policy”, *PacNet*, Number 26, Pacific Forum CSIS, May 5, 2011.